



国民政府『第三厅』：我党领导

抗战宣传工作的精彩篇章

□ 张珊珍

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开张”后打响的第一炮是4月上旬的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周恩来号召大家“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武汉要做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为此，第三厅的各个成员对活动周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周密安排。

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为开端，之后每天一个主题，联袂而出，络绎不绝。第一天举行开幕式，确定为“文字宣传日”。当时“火炬游行，行列绵延数里，经过之地区，市民均以鞭炮欢迎，民气极度振奋”。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那一天虽然大雨滂沱，但1000余支宣传队活跃在街头巷尾，沈钧儒、于右任、邹韬奋等都被邀请作广播演讲。第三天是“歌咏日”。白天，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广场歌咏活动，郭沫若作了“来它个四面倭歌”的动员。晚上，光明大戏院举行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歌声此起彼伏。第四天是“美术日”。巍峨的黄鹤楼两旁展出数百幅抗日宣传画，气氛热烈。当夜幕降临后，又开始了画灯火炬游行，火光映照之下，滚滚长江水浩荡而去，慷慨悲壮之情油然而生。第五天是“戏剧日”。《最后一计》《团结抗日》《日兵暴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话剧、小品琳琅满目。第六天是“电影日”。巡回放映车在武汉三镇各重要地点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抗战影片，同时播放抗战歌曲。到第七天，宣传活动达到顶峰，武汉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近40万群众参加了活动。

两个多月后，第三厅又举办七七事变一周年抗战宣传周。其中的献金活动最感人肺腑。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陈诚反对献金活动，因为第三厅成立前，国民政府政治部曾搞过3天募捐，才募得4000元。不过这次陈诚估计错了。“七七献金”得到了各界、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的热烈拥护，前来献金的既有高官巨贾、社会名流、机关人员，也有艺人、军人和商人，甚至还有黄包车夫、码头工人、擦皮鞋的孩子、澡堂里的揩背工、茶楼酒店的堂倌……不少人献了一次又一次，有些甚至献了十次二十次，“简直是疯了”。

献金活动整整持续了5天，在武汉一地就募捐了10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为贯彻宣传和慰劳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厅又筹建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委托这两个组织到香港购买了10卡车药品和医药器械，还为前方将士赶制了20万套暑衣、40万套棉衣，其中5万套给了八路军。

第三厅的对敌宣传以及国际宣传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这项工作主要由共产党员董维健、杜国庠和冯乃超三位科长主持。他们联络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等，开展日本专题研究、颁发《对敌宣传要点》、协助散发和投放各类反战宣传品、组织在前线对日军喊话、在战俘中组织反战教育活动等；在国际宣传中成功使用世界语对外宣传，创办了一个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半月刊），寄给50多个国家；每周召集外国通讯社记者招待会，发布的材料真实而丰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

意义深远的“第三厅”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武汉，第三厅随同国民政府辗转到重庆。此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逐步改变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1939年10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蒋介石亲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第三厅其他进步人士也纷纷效仿。

周恩来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表示：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蒋介石得知此事，担心这批文化名人都去延安，于是连忙召见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说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需要第三厅的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这其实是蒋介石采取的羁縻之计。然而周恩来将计就计，劝郭沫若等答应下来：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文工会成立后，郭沫若继续任文工会主任。

就这样，国共合作的第三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三厅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极大地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党领导下的第三厅把流亡到武汉的优秀文艺人才吸揽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不仅在当时为全民族抗战大业作出贡献，而且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骨干。许多在当年加入第三厅的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接受党的教育、培训以及战争的洗礼，后来成了新中国文艺界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如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编导史东山、《塞上风云》导演应云卫，电影演员赵丹、金山，漫画家张乐平、廖冰兄，音乐家郑沙梅，历史学家尚钺、蔡仪，外语人才叶君健、张兆林等。

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康小怀

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九龙泉村三五九旅烈士纪念馆内，1945年建成，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时原纪念碑遭破坏。1952年重新维护此碑并建立了保护亭。纪念碑由碑身和碑座组成。碑座正面是由枪、镢头、稻穗、书以及“1945”等组成的图案。枪和镢头象征着“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稻穗象征着大生产取得的丰硕成果；书象征着在紧张的生产战斗之余，广大将士们时刻不忘学习。整个图案也寓意着官兵们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着又学习、又生产、又战斗的先锋模范作用。

碑身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碑身背面是贺龙的题词：“三五九旅九团烈士纪念，为人民服务而光荣牺牲，为革命烈士要坚决复仇。”

碑身左右两侧刻有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芳名录》，包括政治委员陈文彬、组织科长陈友元、营长蓝鸿岐、教导员王继朝、卫生队长吕孝侯、电台队长王洪波6人；连级干部谷忠义等35人；排级干部李瑞臣等73人；班长袁文和等214人；战士王洪武等640人，共计968位烈士。

烈士名录后是碑文（标点为引者所加）：

文彬先烈暨全体殉难将士：你们为驱逐日寇，解放人民，将炽烈的热血洒遍了华北底原野，写成抗战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你们由数十人之骨干在敌后白手起家，创成主力兵团，在千百次英勇对敌搏斗中，毙伤敌伪一万两千余名。晋西北战役克复苛岚、神池、宁武诸县，继而开辟雁北应山朔等县解放区。邵家庄一战，毙敌常风旅团长，细

腰涧、南土岭、陈庄、西张孟、百团大战与冀南讨逆等役，功勋卓著，战绩辉煌，给人民欢腾鼓舞，使敌寇胆颤心寒。四零年奉命回防陕甘宁边区，镇守河防，捍卫边区，粉碎敌顽屡次进攻，使人民安居乐业，并澈底执行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底南泥湾政策，打破敌顽经济封锁，创立了史无前例军队生产自给之奇迹，使荒无人烟的九龙泉成为富饶之区。荆棘梢林的荒山变成良田四万余亩，建筑窑洞、房屋四百多所，计有五万万元以上的革命家畜。整训、练兵、习武、修文，本领提高，思想改进。在这艰巨的斗争中，你们为毛主席底伟大事业奋不顾身，光荣殉难。我们誓要秉承你们底遗志，团结一致，决予复仇，必灭寇寇，必除蠹贼，你们底事迹万古流芳，你们底精神永垂不朽。

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全体指战员谨唁

碑文简要回顾了七一九团白手起家的创建历程以及在千百次英勇对敌搏斗中所取得的卓越功勋和辉煌战绩，记叙了该团回防陕甘宁边区后彻底执行南泥湾政策所创立的史无前例军队生产自给之奇迹，阐明秉承烈士遗志、必灭倭寇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读来深受教育、备受鼓舞。

广大官兵们的光辉生产和战斗事迹，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纪念和回忆，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从大局的使命和担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围攻。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制裁。同时，陕

甘宁边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边区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此背景下，部队奉命从前线调回，开进南泥湾，一方面为了屯垦搞生产，另一方面是加强陕甘宁边区南线的防务。广大指战员高唱“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听党话、跟党走，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的大局观和使命担当，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军队践行宗旨，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大生产运动减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如毛泽东所说：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增强纪律性，改善军民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人民军队，更加踊跃支援前线，支援抗战，有力助推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人民军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三五九旅初到南泥湾，条件非常恶劣。既没有饭吃，又没有住处，穿的衣服也很紧张，还没有生产工具。但是困难没有吓倒这支英雄的劲旅，在他们眼里，办法总比困难多。广大官兵满怀革命乐观主义，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干劲十足，干部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共同吃苦、奋斗到底，取得了生产战斗的巨大成绩。这种作风，同当时国民党的



奢靡形成鲜明对照。正可谓：“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贪图享乐，不可能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

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三五九旅全面践行他们的口号，不但特别能生产，而且还特别能战斗。在开展生产的同时，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坚持“劳武结合”，要求指战员们苦练杀敌本领，努力提高军事技术，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了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李大钊对青年乌兰夫的培养

□ 韩 笑

望着他那深邃的目光，感到大钊同志是最同情蒙古民族的人，深信他提倡的主义，领导的党，才是拯救蒙古族同胞出水火的政党”“他与我们这次长谈，使我们这些在茫茫长夜中徘徊的蒙古族青年，看到了希望之光。”

为了更好地提升乌兰夫等人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李大钊和其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区委还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乌兰夫和一些同学参加了这一研究小组，每周在铁狮子胡同的一座古庙中进行集中学习，李大钊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则在集中学习时前来作辅导。在李大钊等人的教育引导下，乌兰夫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文献，较为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清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重要问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逐步实现了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

实践引领、斗争锤炼。在北京蒙藏学校期间，李大钊积极引领乌兰夫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从1924年春到1925年10月，乌兰夫在日益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在实践中进一步经受了锤炼。

1924年3月，中共北京区委于北京大学组织悼念革命导师列宁的大会。乌兰夫和同学云润、佛鼎在会场外担负守门任务。由于政治认识不够、斗争经验不足，一时误将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成帝国主义分子拦在了会场外，闹了误会。为此，李大钊等人到蒙藏学校同乌兰夫等人进行了谈话，指出不应盲目排外，而

要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团结自己的同志、朋友以更好地打击敌人。这次谈话使乌兰夫等人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提升。

1925年初，中共北京区委决定由蒙藏学校的党团组织创办一个立足于内蒙古地区实际的革命刊物，以进一步在内蒙古地区宣传党的理论。乌兰夫和同学多松年、奎璧接受了这一任务。在办刊过程中，李大钊对乌兰夫等人进行鼓励并提出相关意见。经过努力，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于1925年春成功创刊出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蒙古农民》前后总共只出版了3期，但是却被广泛地发放到内蒙古地区各地，发挥了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受到了李大钊的好评。

1925年6月上旬，在高潮渐起的五卅运动中，中共北京区委派乌兰夫同时任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负责人的吉雅泰一同返回绥远开展革命斗争。他们返回绥远之后，在绥远学联的帮助下，组织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持续一个月之久。李大钊对这一斗争的开展给予了充分肯定，称“它将和全国的革命烈火融为一体，烧死帝国主义、军阀和他们的走狗”。

选送苏联、学习深造。为了更好地培养蒙藏学校的这些进步蒙古族青年，党组织及李大钊决定分别选送他们到广东以及苏联、外蒙古等地进行学习。1925年10月，党组织决定选送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乌兰夫和云

润、多松年、康根成、荣照共5人北上前往苏联进行学习深造。

在乌兰夫等人启程之前，李大钊同他们谈了话。在谈话中，李大钊对乌兰夫等人提出了三点嘱托：一是要好好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二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因为苏联的各项建设刚起步不久，还比较困难；三是要在学习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站稳政治立场，因为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去苏联学习的人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各种思想观点错综复杂。这次谈话使乌兰夫深深地体会到北上求学苏联的重大责任和艰辛。谈话结束告别时，李大钊又向乌兰夫等人寄语：“祖国在期待着你们，蒙古族在期待着你们，我祝你们满载而归！”乌兰夫等人则向李大钊表达了“绝不会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的决心和信念。带着李大钊的殷切嘱托，乌兰夫于当月乘火车由北京到达上海，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登上了去苏联的轮船。1925年底，乌兰夫经海参崴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从此，乌兰夫在苏联学习、工作了3年半之久，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教学翻译，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翻译工作、听过斯大林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演讲、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经过在苏联的学习、工作，乌兰夫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不断走向成熟，为日后投身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放异彩的抗日宣传周活动

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